

在增强供需适配性平衡性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李 涛

学习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
专家谈

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对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管理和调控,不仅是市场运行的驱动力,也是政府政策的落脚点,《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多篇著作对此作出深刻论述。比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指出:“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指出:“要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动经济运行在供需两侧呈现出新特征。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洞察经济发展规律、精准把握供需关系变化新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于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对于在增强经济发展平衡性中推动高质量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中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我们党对供需关系的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下,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生产力水平的巨大飞跃,也体现了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完善。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传统要素驱动力减弱,供需矛盾从“总量缺口”转化为“结构错配”。一方面,内需不足仍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如消费需求的收入支撑不够、民间投资的活力未能充分释放等;另一方面,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面临挑战。我们审时度势,强调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的重要论述,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经济问题提出的。具体来看,适配性表现为供给与需求两侧动力强劲、总体匹配,二者通过向更高水平主动调整,实现在结构与效能上的总体适配。供给侧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可以形成自主可控、质量引领的产

出能力,适配有效需求并创造新需求;需求侧依托收入增长与结构优化,可以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实现更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平衡性表现为供给与需求两侧动态平衡、良性互动,二者通过多种机制的有效互动,趋向并形成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这离不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供给通过“有进有退、有保有压”的结构性调整主动靠拢需求,需求也通过自身升级与持续增长来牵引供给,最终畅通经济循环,提升发展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的重要论述,标志着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解决供需矛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只有在应对惊涛骇浪中掌握发展主动权,既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又善于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挖掘内需潜力,不断扩大内需,才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坚实基础。

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不仅植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更具有深厚的理论底蕴与重大的创新价值,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来考察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并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失调问题,指出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两者相互依存、互不可缺。这对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需关系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关于生产和需要关系的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从适配性和平衡性两个方面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需关系,并强调适配性与平衡性的辩证统一。适配是平衡的基础,没有精准适配的平衡容易形成“低水平均衡”;平衡是适配的保障,脱离平衡的适配往往难以持续。这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关于生产和需要关系的理论新的时代内涵。

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植根于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实践,从多个维度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的深刻反思与整体超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价值观上的超越。西方经济学通常将“理性人”假设为理

论基点,关注抽象的市场效率与个体效用,往往遮蔽了真实社会关系中人的多维需求与发展权利。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供需互动的目标,将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供需平衡的尺度,使理论超越了冷冰冰的物与数的计算,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是在历史观上的超越。西方经济学往往致力于提炼超越时空的所谓供需“一般规律”,容易陷入脱离实际和发展条件的教条主义。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强调一国供需关系管理的侧重点必须依据其发展阶段的客观变化来进行战略抉择,要求适应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揭示了我国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一历史过程的思想脉络,回应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需求。

三是在方法论上的超越。西方经济学分析大多预设了一个可被趋近或恢复的静态均衡状态,将经济系统类比为寻求稳态的机械装置,对供给与需求的管理和调控往往是割裂的。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对供给与需求的管理和调控视为不可割裂的整体,将经济发展理解为一个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螺旋上升的持续互动过程。它所追求的动态平衡,是一种供给与需求在质量和结构上不断相互匹配、相互激发的适应性稳定状态,是一个内生于发展进程的、主动构建的良性循环。

四是在对策论上的超越。西方经济学通常认为“市场与政府非此即彼”,政策工具也多局限于总量层面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将战略规划的前瞻性、制度改革的纵深性与政策调控的灵活性有机结合,不仅包含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更涵盖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结构性政策、以激发内生动力为目标的改革性政策,以及以引导市场预期和行为为目的的指导性政策,为大国经济在复杂变局中推动供需动态平衡,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在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中彰显实践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中指出:“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既是对过往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引,在解决供需矛盾中已展现出强大的实践力量。“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

系,继续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中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在实践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们改变了过去过度依赖“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立足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推动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充分证明,正是依靠强大国内市场,我们才在各种风险挑战中站稳了脚跟,保持了经济的韧性。着眼长远,必须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促进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在消费方面,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在投资方面,聚焦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and 人的全面发展投资,积极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和无形资产投资。通过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与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的相互促进,为抵御外部风险构筑深厚的战略腹地。

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指出:“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推动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显著提升,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着眼长远,必须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培育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提供更多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以自主可控、优质高效的供给满足现有需求、创造新的需求。

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在动态平衡中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指出:“宏观调控必须适应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该扩大需求时要扩大需求,该调整供给时要调整供给”。在实践中,我们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提高了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益。面向未来,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宏观政策上更加注重统筹兼顾,着力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聚焦民生保障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余少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法治为民宗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瞄准民生工作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不断强化法治保障。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法律部门,社会法是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特殊群体权益保护、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在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满足新时代民生保障领域法治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化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更好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法学支撑。

立足中国现实 遵循学科发展规律

社会法学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要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际,在破解民生保障的制度性难题、更好增进人民福祉中推进学术创新。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社会治理模式面临深刻调整。我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本身蕴含着对社会公平正义、对民生保障的更高追求。新时代以来,我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同时在提升就业质量、维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等领域面临一些新挑战,这对完善民生保障制度、提升民生保障制度效能提出了新要求。作为调节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法律部门,社会法也必须在适应时代发展、满足时代需要中实现自身发展。

从实践看,民生领域立法进程加快、多部门协同发力持续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等,体现了社会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的重要作用,也推动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快构建,更好服务民生事业发展。

从理论看,社会法学存在基础理论相对薄弱、概念界定不够统一、话语体系不够成熟等问题。相对于其他法学学科,我国社会法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共识不足,部分研究仍停留在对国外理论的移植上,未能充分结合我国立法实践与社会实际。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遵循学科发展规律,植根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从当前社会发展阶段出发,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在推动社会法从“部门法实践”向“成熟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提炼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助力解决人类共同关切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

把握价值导向 完善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回顾我国社会法的发展历程,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基本发展、基本尊严是社会法突出的特点。这决定了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和逻辑前提。

为此,要始终把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人民幸福生活作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起点,深入研究如何通过法律制度设计和有效执行,实现劳动法、慈善法等不同社会法以及社会法与经济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部门的相互衔接、高效协同,在更好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的过程中体现我国社会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社会学理论区别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标志,奠定了中国社会学具有充分自主性的价值根基。

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法学的理论体系。可从基础理论、制度规范、实施保障3个板块入手。其中,基础理论板块主要研究我国社会法的本质、概念、基本原则、价值目标等基本理论问题;制度规范板块主要研究劳动、社会保障、反歧视等具体领域的法律制度设计问题;实施保障板块主要研究社会法的执法机制、司法救济、社会监督等执行落地问题。3个板块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可以形成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围绕前沿问题 加强学术创新

问题是学科产生的起点,也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源。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围绕前沿问题推动我国社会学创新发展。要聚焦重点领域立法实践,针对就业促进、社会保障、养老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民生热点问题,开展实证研究。例如,针对平台经济运行中劳动关系认定难、社会保障覆盖不全等问题深化研究,有利于推动劳动法适应实践发展。此外,我国各地在民生保障方面形成了诸多有益探索。要深入研究地方创新经验,通过对这些实践经验的学理化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社会法学理论成果。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侵犯个人隐私、算法滥用等新问题不断涌现。社会法学要主动拓展研究边界,将数字时代的民生保障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回应人民群众新需求。

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加强学术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一是总结提炼核心范畴,比如,可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社会权利”“给付义务”“社会共济”等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形成凝聚学术共识、彰显文化主体性的法学范畴,并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成果编入教材,融入教学过程。二是围绕制度创新深化理论构建。针对我国独特的民生保障制度建设问题,比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律保障机制等,开展体系化研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发现理论短板,修正理论偏差,产生中国自主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三是重视方法创新,打破学科壁垒,融合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方法,推动多学科交叉研究,深化“规范分析+实证研究+比较借鉴”的综合研究,以高质量研究成果积极服务法律制定和实施,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增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解释力、说服力、指导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推动科技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肖永亮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与精神符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在文化强国与数字中国建设双重背景下,科技赋能已成为破解非遗保护传承难题、激活其时代生命力的重要手段。推动科技赋能非遗保护传承,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国家高度重视非遗保护传承,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实施非遗数字化保护工程;各类非遗展演活动丰富多样,非遗主题影视作品不断涌现,VR(虚拟现实)展厅、5G直播等数字化载体拉近大众与非遗的距离,社会各界对非遗的关注度持续提升;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模式依托数字技术不断创新,线上线下传习方式深度融合,为非遗技艺传承注入新的活力。同时,非遗保护传承仍然面临诸多难题。比

如,技艺断层带来失传风险,资源有效整合和共享机制不多,存在同质化倾向,科技赋能不充分等。有效应对这些现实挑战,需要以科技为抓手,构建文化为核、技术为用的系统性赋能体系,推动科技更好赋能非遗保护传承。

坚持多维度数字化赋能非遗保护传承,构建可持续发展体系。实现科技赋能非遗保护传承,要从保护、传承、传播、发展多方面系统发力,形成“精心保护—要素创新—开发市场—反哺传承”的良性循环。在保护维度,以数字技术构筑“保险箱”。通过三维激光扫描、多光谱成像、动作捕捉等高精度采集手段,对非遗技艺等进行全要素记录,构建可追溯、可复用的“数字基因库”。在传播维度,以智能技术打破时空壁垒。依托数字人、虚拟人仿真技术赋能非遗活态传承,让非遗传承人借助直播和3D建模实现“云端授艺”,降低学习门槛。在传播维度,以沉浸式技术引发文化共鸣。比如,非遗工坊可依托VR技术让用户沉浸式体验制瓷流程,古街古镇可借助AR(增强现实)技术增强叙事魅

力。在发展维度,以数字创意拓展价值边界。开发非遗数字藏品、用AI(人工智能)辅助设计非遗产品,将非遗内容融入微短剧和影片创作等。

以数智技术精准破解非遗传承痛点,激活非遗活态发展内生动力。针对高龄传承人技艺流失风险,运用传感器与物联网技术开展濒危项目动态监测并及时干预,借助深度学习算法解析传统技艺风格特征,赋能非遗实物修复与技艺复原。破解保护碎片化难题,推动建立国家级非遗数字资源库,制定统一采集、存储、共享标准,打通文旅部门、博物馆、高校间数据壁垒,整合相关资源。破解形式同质化问题,依托生成式AI解构非遗纹样、色彩基因,生成契合当代审美的设计方案;结合用户画像与智能推荐系统,开发差异化文创产品。要注意破解科技表层化问题,让技术应用以文化价值传递为核心,坚守文化本真。比如,机器人跳竹竿舞、“AI+航拍”特色体验等,让传统文化在保留文化辨识度的同时,增添鲜明科技属性。

统筹制度、人才、机制,打造协同赋能

的可持续生态。从制度、人才、机制方面夯实配套支撑,能让科技赋能非遗保护传承长效落地、行稳致远。强化制度保障,加快制定非遗数字化全链条技术标准,完善数字版权、数据安全等法规,建立“确权—授权—维权”闭环管理机制。深化协同创新,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引导企业、高校与传承人联合攻关。比如,有的院校开设数字非遗相关交叉专业,以产教融合培育复合型人才。促进国内传播与普及,依托非遗数字创作大赛、非遗工坊等载体,引导公众成为非遗创作、传播主体。加强对外传播,拓宽国际传播渠道,推动融合非遗元素的数字产品出海,以科技为桥梁讲好中国非遗故事,提升中国非遗国际影响力。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专题深思